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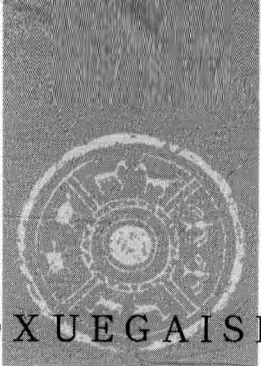


GUOXUEGAISHUO

国学概说

◎ 边家珍 著

齐鲁书社



GUOXUEGAISHUO

国学概说

◎ 边家珍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概说/边家珍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13. 8
ISBN 978-7-5333-2744-6

I. ①国… II. ①边… III. ①国学—基本知识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2046 号

国学概说

边家珍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485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744-6

定 价 80.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国学”的概念及其使用	1
二、本书的宗旨与范围	3
三、学习国学的方法	3

第一编 经 学

绪 言	7
一、经·圣·道	7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9
三、“师法”与“家法”	10
四、经学的文化影响	11
第一章 历代经学概说	17
一、春秋战国经学	17
二、汉代经学	20
三、魏晋南北朝经学	28
四、隋唐经学	31
五、宋元明经学	32
六、清代经学	35
第二章 十三经概说	41
一、十三经总论	41
二、《周易》	43
三、《尚书》	51
四、《诗经》	56
五、《周礼》	63
六、《仪礼》	67
七、《礼记》	70

八、《左传》	73
九、《公羊传》	77
十、《穀梁传》	80
十一、《论语》	83
十二、《孝经》	85
十三、《尔雅》	88
十四、《孟子》	89
第三章 经学要籍解题	93

第二编 史 学

绪 言	115
一、“史官”与“史官文化”	115
二、读史的方法	117
第一章 历代史学概说	119
一、先秦两汉史学	119
二、魏晋南北朝史学	122
三、隋唐五代史学	124
四、宋辽金元史学	126
五、明清史学	127
第二章 史书概说	130
一、史书总论	130
二、《史记》	134
三、《汉书》	142
四、《后汉书》	145
五、《三国志》	148
六、《晋书》	150
七、《宋书》	152
八、《南齐书》	153
九、《梁书》、《陈书》	155
十、《魏书》	156
十一、《北齐书》	158
十二、《周书》	159
十三、《隋书》	160
十四、《南史》、《北史》	161
十五、《旧唐书》	163

十六、《新唐书》·····	165
十七、《旧五代史》·····	167
十八、《新五代史》·····	168
十九、《宋史》·····	169
二十、《辽史》·····	171
二十一、《金史》·····	172
二十二、《元史》·····	173
二十三、《明史》·····	175
二十四、《清史稿》·····	176
二十五、《资治通鉴》·····	178
二十六、《通鉴纪事本末》·····	180
二十七、《宋史纪事本末》·····	181
二十八、《明史纪事本末》·····	182
二十九、《左传纪事本末》·····	182
三十、《通典》·····	183
三十一、《通志》·····	184
三十二、《文献通考》·····	186
三十三、《史通》·····	187
三十四、《读通鉴论》·····	189
三十五、《文史通义》·····	190
三十六、《十七史商榷》·····	191
三十七、《廿二史劄记》·····	192
三十八、《廿二史考异》·····	193
三十九、《考信录》·····	194

第三编 子 学

绪 言 ·····	199
一、子学的渊源 ·····	199
二、子学文献及其真伪问题 ·····	201
三、子学的主要内容 ·····	202
第一章 先秦诸子概说 ·····	205
一、先秦诸子总论 ·····	205
二、孔子 ·····	209
三、子思 ·····	218
四、孟子 ·····	219

五、荀子	223
六、墨子	227
七、老子	232
八、庄子	237
九、管子	243
十、商鞅	246
十一、韩非	248
十二、孙武	251
十三、孙臆	254
十四、邹衍	255
十五、公孙龙	256
第二章 魏晋玄学概说	259
一、玄学总论	259
二、何晏	262
三、王弼	263
四、阮籍	265
五、嵇康	266
六、郭象	267
第三章 宋明理学概说	269
一、宋明理学总论	269
二、周敦颐	272
三、邵雍	274
四、张载	275
五、二程	276
六、朱熹	278
七、陆九渊	282
八、王阳明	284

第四编 文 学

绪 言	291
一、文学的范围与分类	291
二、文学的功用	292
三、文学的雅与俗	293
四、文学的鉴赏	294
第一章 诗	295

一、诗的体制	295
二、历代诗歌概说	296
第二章 词	308
一、词的体制	308
二、历代词概说	309
第三章 散曲	315
一、散曲的体制	315
二、历代散曲概说	316
第四章 散文	319
一、散文的范围与分类	319
二、历代散文概说	319
第五章 戏曲	327
一、戏曲的基本特征	327
二、历代戏曲概说	328
第六章 小说	335
一、古典小说的基本特征	335
二、历代小说概说	335
第七章 文学要籍解题	342
 主要参考书目	356
后 记	358

引言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元素,就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个体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包括隐性而又具有约束力的人生态度、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历史悠久,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对于这种普遍的文化认同之达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只有善于继承发扬其固有学术文化遗产的优秀成分,才能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才能更好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不丢失自己。从个体的角度讲,今日社会的快速进步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有学识、有修养的人才,而国学正可以“古为今用”,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与思想水平。郭沫若先生曾说:“我们是用中国字、中国语言学东西的人,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①这话讲得很实在、很中肯。

一、“国学”的概念及其使用

“国学”一词,早在先秦就有了。《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的话,孙诒让《周礼正义》解释说:“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礼记·学记》里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国学”最早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了区别西方学术和我国两千多年来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传统学术文化,人们把前者称为“泰西之学”或“西学”,而把后者称为“中学”,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就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将西洋学术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为“旧学”。也有一些学者出于保存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而将其称为“国粹”或“国故”,如20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后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均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学”一词逐渐通行起来。

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国学”这个显得有些笼统的概念来

^① 郭沫若:《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见《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指称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呢？应当说，这与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有密切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整体性、综合性，不是说“国学”等于经、史、子、集的简单相加——像一个数学公式那样，而是说所谓“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都是在同一个文化母体中生成的，它们在内涵上是有交叉重合的，是互通互补、相生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是一体的，是相济为用的。今天，学术的发展需要越来越精细的分科，但“国学”这一概念为我们从整体上观照和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首先，从古代目录分类来说，经、史、子、集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始于两汉之际刘歆的《七略》，后经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再经荀勖《中经新簿》之分甲、乙、丙、丁，最后形成了《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四大部类书籍，实际上有很多是相互交叉的，是有很多内在关联的。比如说，《诗经》本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本为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皆被尊为“经”。《论语》、《孟子》本来都属于子书，《论语》在东汉时成为经书；《汉书·艺文志》中《孟子》还在儒家类，至宋代而进入经部。经书《礼记》的《月令》篇也见载于《吕氏春秋》。子书大都是政论文，而《荀子》中的《赋篇》近于“纯文学”。文集《昭明文选》中，收有贾谊《新书》中的《过秦论》；《韩昌黎文集》中《原道》、《原性》、《原毁》诸篇，纯然子书之体。

其次，经、史、子、集各部分本身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性。例如经部的书，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经书里包含着自然和社会的丰富知识，天文地理、草木鸟兽、人伦政事诸方面都有。子部书也是这样，尽管大多数子书以讲“治术”为主，但每一种子书里也都包含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学问，例如《管子》中就有农学方面的内容，《墨子》里有逻辑学、几何学方面的内容。

再次，就各类书的作者而言，他们的知识结构往往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例如，汉代的文学家扬雄从小就喜好经书，曾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称写作辞赋的宗旨是“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智（智）”，“要合‘五经’”（《汉书·扬雄传》）。在班固《两都赋·序》里举出的辞赋家中，兒宽是《尚书》博士；孔臧通经学；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萧望之通《齐诗》学，又是《鲁论语》的知名传人。班固本人也是深于经学的，曾编辑白虎观论讲经义为《白虎通义》。因而他们在进行辞赋创作时，自然会“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

最后，从学习者的角度看，一般来说，学习哲学的人应当读经部和子部书籍，学历史的应读史部，学文学的应读集部，当然没错。然而事实上，只要你的学习、研究走向深入，就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部类中，因为认知的对象、研究的问题常会涉及方方面面，必然要求你有比较广泛的涉猎。譬如说专门研究文学的，如果完全不看史部书与子部书，那就很难做到知人论世。同样，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一点儿不读经部、子部、集

部的书籍,恐怕连最基本的史料都掌握不全。实际上,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是经、史、子、集兼通的。

因此,我们认为,用“国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更能凸显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特点,更切合其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国学”概念提供的独特视界,应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史、子、集的内在联系,更好地理解传统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或许这也正是“国学”一词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仍有其生命力的内在依据。

二、本书的宗旨与范围

本书旨在使读者对国学的主要特点、发展历史以及相关的人物、著作、研究文献等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因此力求内容充实,重点突出,完整系统;不掉书袋,不做无谓的争论,以切合实用为标准。1934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其讲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①。显然,他在重视传统学术基础(“文字学”等)的同时,是以经、史、子、集为国学的核心内容的。本书大体上参照章太炎先生的讲法,舍去其“小学”部分,于“引言”之下分“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四编展开论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子学”范围的界定问题。传统的子部书籍,是在先秦诸子著述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基本上是诸子著作的分类表和总目录。魏晋以降,子书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南朝齐时王俭编《七志》时,第二项列“诸子类”,著录“今古诸子”。《隋书·经籍志》专列的“子部”,成为四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录诸子“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宋代理学产生后,出现许多思想理论著作,又扩大了子书的范围。今天看来,子书主要包含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大体上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本书所讲的“子学”主要包括“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三个部分。

三、学习国学的方法

国学源远流长,头绪繁多,内涵丰富,学习者常有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的困惑。要认识到,国学是不可能一下子都能搞懂、都能掌握的,它需要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促动的过程。若能循序渐进,逐步积累,不急不躁,真心用力,学问定能潜滋暗长,不断提高。

学习国学,要多读原典。一般教材式的书籍也引用原典,但大都是寻章摘句式的、较

^① 参见罗检秋:《也说“国学”》,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为零散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徒然让人知道一些表面的、鸡毛蒜皮的东西。因此,要完整地、深入地学习国学,就要在阅读原典上多下一番功夫,正如叶圣陶先生说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咏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①

学习国学,要多动脑筋。古人有好多深邃的思想,尤其是那些用格言式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如果不认真思考,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例如《周易》里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论语》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都需要我们好好思索一番。国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凝结,蕴含着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观念,就是与现代民主观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不能毫无原则、不辨是非地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学习国学时应持的基本态度。

学习国学,要注重切己体察。所谓“切己体察”,就是在读书时联系自己的固有知识、社会经验、人生感悟等来理解。程颐有言:“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二程遗书》卷一七)朱熹说:“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又说:“取《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切己体察,着己践履,虑心体究。”(《朱子语类》卷一一、卷一二一)这些言论,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学习、研究国学,还应重视考古文献。有相当多的彝器铭文、竹简、帛书等,都是重要的国学文献,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面世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定县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荆门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其中有不少是久已亡佚的珍贵文献,也有曾被后人视为伪书的文献,相当清楚地展示出比较原始的古代典籍的面貌,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今信息时代,网络上登载有不少国学资料。例如,国学网的“文献部”就有不少经、史、子、集电子版书籍;台湾“中央研究院”网“汉籍电子文献”里有《二十五史》、《十三经》、《乐府诗集》、《词话集成》乃至“汉籍全文资料库”的检索;北京大学中文系网里有“中国历代典籍总目”检索系统、《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使用起来都很方便。使用电子文献的时候需要注意,有些字在电脑上不能显示,有些电子版书籍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若需摘录、引用,一定要核对原书。

“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徐幹《中论·治学》),有志者勉之。

① 叶圣陶:《读〈经典常谈〉》,载《中学生》1943年8月第66期。

第一编 经学

绪 言

经学^①,是通过对经书的阐释来体现、发挥某种思想、观念的学问。“经”,最初字形写作“𦉰”,首见于周代青铜器铭文。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段玉裁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引申为纲纪之意。《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说:“经,纲纪之谓也。”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以“经”指称具有典范性、纲领性的前代典籍。最初被儒家奉为经书的有六种,即“六经”,亦称“六艺”,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②。《乐经》不存^③,因而又有“五经”之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由儒家的一门之经,一变而成为汉王朝之经、天下之经。于是,以五经的传授、评说、笺注、阐释为基本内容的经学,遂备受推重。

一、经·圣·道

在汉代人眼里,经典具有全能的特性,可以经天纬地,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有,其功能简直是无限的。仅一部《春秋》,司马迁就说它“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两汉之际的扬雄甚至说“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未矣”(《法言·吾子》)。因此,在汉代,人们普遍笃信经典包容有关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知识,可以从中找到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总结的:“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④

① “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

② 关于“六经”的次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礼记·经解》中的次序是《诗》、《书》、《乐》、《易》、《礼》、《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本《七略》,次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③ 一说《乐经》焚于秦始皇时;一说本无其书,“乐”只是附于《诗》的乐谱,或包括于《礼》中。

④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

儒者所信奉的经典,不过是一些古典文献,它们被奉为经典,除了某种特定的历史机缘之外,盖与古人的“圣人”意识有关。“圣”字的原意是耳目聪明,只具有认识或知识的含义,随着儒家“圣人”意识的强化,圣人就成了传统思想权威的象征,被升华、抽象为一种理想、规范、准则、榜样。“圣人”人格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道德圆满。孟子说:“规矩,方员(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在道德上是圆满无缺的,其行为自然合乎仁义。二是明哲绝伦,无所不知。圣人被认为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圣人能够通达绝对真理——“道”,所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当人们遇到问题时,往往把圣人之言当成裁决是非的最高标准。扬雄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法言·吾子》)三是功业博大,普济万民。孔子认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者,入乎圣域。要之,圣人既是道德的范本,又是最高智慧的化身,同时又是真理代表。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有能力创作出经典来。

崇经、尊圣,其目的都在于明道。某个人能否获得圣人的称号,不是取决于他的主观愿望,而是以他对道的体认、觉解、践履为尺度的。如果不是为了明道,圣人和经典及其权威则不得其传,就只能属于过去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刘勰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简捷地概括了“道”、“圣”、“经”的基本关系。圣人所垂之“文”就是“经”,这不仅因为“五经含文”,且“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文心雕龙·情采》)。圣人之道,须借助经典而得传,道则因圣人之传而更加彰明。可以说,圣人的权威就是经典的权威,经典的权威也就是圣人的权威。

经典、圣人与自孟子开始逐渐形成的“道统”意识,在功能上相互配合,使儒家经学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绵延不绝。《白虎通义·五经》中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经典可以统摄一切、权衡一切,甚至被视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唐代及其以后的科举制,更是把这一思维定式引向了极端——言必称尧舜、行必法三代,成了很多读书人的信条。在他们的眼中,对于圣贤经传的任何怀疑、蔑视,都是不可思议和不能容忍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经学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经学也是读书人的进身之阶,通过它可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经学与个人、家庭、群体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汉代察举选拔人才补充官僚队伍,举孝廉、茂才,实际上都与经学有关,而且又特设明经一科,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以示对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生的特殊关照。西汉中后期,明经取士即已盛行,不少儒者由此途升任高官。如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以明经为博士,龚遂以明经为昌邑郎中令,眭孟、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盖宽饶以明经为郡文学,韦贤、韦玄成父子更以明经先后登相位。当时邹鲁一带有民谚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经学,又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秦代的“书同文”即以小篆作为标准的字体。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的“古文”,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名之曰“古文”。在战国后期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这里所说的“古文”、“今文”,就是以《尚书》传本之古、今文字而言的。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代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如《仪礼·士相见礼》中的“一”与“壹”、“终”与“众”、“甫”与“父”、“毋”与“无”、“伸”与“信”、“早”与“蚤”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家多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见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实际,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重新建构其政治意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